

◎ 李伯齐 主编

# 山东分体文学史 · 诗歌卷

齐鲁书社

# 山东分体文学史 • 诗歌卷

◎ 李伯齐 主编

齊魯書社

# 山东分体文学史

## 诗歌卷

主 编 李伯齐  
副主编 王 勇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东分体文学史丛书. 诗歌卷/李伯齐主编. —济南: 齐鲁书社, 2005. 1

ISBN 7-5333-1436-0

I. 山… II. 李… III. ①文学史—山东省 ②诗歌史—山东省—古代 IV. I209.9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6916 号

山东分体文学史丛书

诗歌卷

李伯齐 主编

---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
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邮 编 250001

E-mail qlss@sypress.com.cn

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32 开

印 张 18.375

字 数 410 千
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33-1436-0/I·305

定 价 45.00 元(全套 4 册定价:152.00 元)

---

**丛书编定者**

主 编 李伯齐 许金榜

副主编 王 琳 王恒展

**本卷著者**

前言、先秦部分 李伯齐

汉至南北朝部分 王 玲

隋唐至元部分 王 勇

(李清照、辛弃疾两节 王勇 王伟伟 高瑞琴)

明清部分 刘靖渊

# 总 序

地域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，而地域文学研究则是近年才提起的一个话题。如何看待文学的地域性，以及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，都是这类研究首先面临的问题。文化的地域性，不少学者有所论及，而文学的地域性则尚在探讨之中。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；一个民族的文学，是其民族文化直接、生动而形象的反映。文化的地域性，必然影响到文学。但中国文化的地域性主要表现在先秦时期，秦、汉统一之后，统一的中华文化逐渐形成，地域文化的界限也逐渐消泯，其独立形态已不复存在。如何看待地域文化的影响，如何认识这类影响与文学的关系，又是一个新的课题。

山东作为行政区域，是金、元以后的事情。明、清以来，山东辖区也经常变动。为叙写方便，本书所指“山东”，为今之山东省所辖的范围，大致为先秦齐鲁故地。谈论山东文学，就不能不涉及山东的地方文化，特别是与存在于先秦时期的齐鲁文化的关系。

齐鲁文化是存在于先秦时期的地域文化，其渊源、形成及

其特征，有不少专门论述，不是本书研究的范围。就一般情形而言，齐鲁文化的形成，社会历史因素自然是主要的，如齐、鲁建国初期所实行的政策及其治国方针等，而从地域角度考察，其形成也与它们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远古时代，人类的生存受自然环境的制约，而产生对自然的依赖。自然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。平原地区的人们，从事农桑；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生活着的游牧民族，则逐水草而居。人类各族群具体的生活环境及其生存方式，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的形成，必然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，并进而影响到人们的心理、精神和气质。譬如先秦的齐、鲁今天同属山东省，而在古代却属两个文化类型区。齐地东濒大海，西有黄河、济水流贯境内，南界泰山，北临渤海。在地缘上海陆两便，农牧而外，兼擅渔盐之利。而鲁地处泰山之南，地势比较平坦，丘陵和平原都适于农牧。生活在海滨的人们，重视商业利益，注重智谋才干，思想较为开放、活跃；而生活在山区和平原的人们，则以耕牧为主，重农重桑，安土重迁，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谐和相处，思想则相对较为保守。因此，齐国出现了齐桓公、管仲这样极富改革精神的政治家以及开放型的稷下学术，而鲁国则出现了孔子、孟子这样古代文化的传承者，以及适应农耕社会、延续几千年的“孔孟之道”。当然，形成某些文化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，而地域文化的因素则是不可忽视的。秦汉以前，分散的、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，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，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就是最显著的例子。而在秦汉之后，地域文化逐渐融入统一的中华文化之中，其独立形态已不复存在。但作为文化积淀，特别是沉积在人们心理、精神和风俗习惯之中的某些因素，仍然对当地人们

产生影响。因此，今天以今政区为范围的山东文学研究，仍然与齐鲁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## 二

研究一个区域的文学，涉及的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它与全国文学发展的关系。

齐鲁自古为文学之邦，是中国文化学术的重要发源地。先秦时代，齐鲁特别是邹鲁一带，人文荟萃，是我国散文最为发达的地区。中国散文奠基时期的作品，作者大都为齐鲁人。就史传散文而言，第一部编年史《春秋》，相传为孔子编定；为传述《春秋》而作的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相传作者左丘明为鲁国人；第一部国别史《国语》的作者，据司马迁等的说法，也是左丘明；第一部史传文学作品《晏子春秋》，作者是齐国人。诸子散文，如《论语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孟子》等，书中记载孔子、墨子和孟子的言论行事，编著者也为齐鲁人。据近人考证，庄子为山东东明人（冯友兰认为是山东曹县人，见其所著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）。其他，如编辑管仲言论的《管子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《晏子》、《田俚子》、《鲁仲连子》、《牟子》、《田子》、《黔娄子》、《邹奭子》、《邹子》等，编著者都是齐人。这些散文作品，不只对齐鲁地区，也对我国传统文学思想、文学观念的形成，以及散文体制、语言风格，都曾产生重要影响。譬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两书中记载的孔子和孟子有关文学的言论，以及孔孟学说，经过后学的补充、阐发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体，对我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形成，曾经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。其中，有关文学艺术的言论，则是形成我



国早期文学理论的基础。再如史传散文的重史意识。儒家重视文化传承，因而重视历史。面对社会变动，儒家重史的着眼点一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，警戒当世，一是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历史依据。这种重视现实、讲求实际的态度，就要求记述史实的文字质朴、简洁。着眼于社会政治，对叙述文字的要求，对齐鲁乃至全国文风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齐鲁也是中国诗歌理论的发源地。被朱自清先生称为“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”的“诗言志”，最早见于《尚书·虞书》，是虞舜任命夔为乐官时所说的话。而“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也”<sup>①</sup>，诸冯据考为今山东诸城市；东夷是今山东地区上古时期的土著居民，而舜则是东夷文化的代表。中国诗歌理论发轫于《尚书·虞书》，而奠基于孔子。《论语》中有关诗歌本质特征及社会功用的论述，奠定了我国古代传统诗学理论的基础。自汉至南北朝，籍出山东的郑玄、刘桢、颜延之、檀道鸾、王筠、任昉、徐陵、颜之推有关文学批评的言论，特别是刘勰体大思精的《文心雕龙》，使我国文学理论获得重大发展。唐宋时期，籍属山东的崔融、王禹偁、穆修、石介；明清时期，李开先、李攀龙、谢榛、王士禛、赵执信等，他们有关诗文创作的论述，都曾对当时文坛风气产生重要影响。“建安风骨”、“左思风力”，对我国诗风的影响极其深远；王融与沈约倡导的“永明体”诗，以及何逊、徐陵等人的创作实践，对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变，则具有重要意义。唐宋古文运动，孙逖、吕才揭槩于前，王禹偁、穆修、石介等发扬于后，对于推动散文革新也曾起到一定作用。宋、元之际，东

① 《孟子·离娄下》。

平曾一度成为北方的文化中心，也成为戏曲创作的中心。明、清时期，边贡、李攀龙等前后七子的诗文革新运动与济南诗派，王士禛的“神韵”诗论与康熙诗坛的王派诗人；明清小说、戏曲，如东平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平妖传》，淄川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、《醒世姻缘传》，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等等，其影响所及，亦非仅只山东一地。而山东籍文人的诗文批评，就其基本倾向而言，大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归，则应与地域文化的影响有关。

### 三

秦汉以来，山东地区诗文作家灿若群星，其中不少是所在时代的代表性作家。如建安时代的孔融、王粲、刘桢、徐幹，西晋的左思，东晋的王羲之，南朝的颜延之、鲍照、王融、何逊、徐陵，北朝的温子昇、王褒、颜之推，唐五代的崔融、孙逖、刘沧、段成式、和凝等，宋元时期的王禹偁、穆修、晁补之、李清照、辛弃疾、杜仁杰、张养浩等，明清时期的边贡、李开先、李攀龙、王象春、宋琬、王士禛、赵执信、田雯、曹贞吉、孔尚任，以及罗贯中、蒲松龄等小说名家等。他们的诗文、小说和戏曲创作的艺术成就与他们的文学主张及其理论，都在全国造成广泛影响。

唐、宋以后，特别是明、清时期，山东地区除了影响全国的大家之外，在全省各地都活跃着一批地方作家。他们有的与世隔绝，其诗文成就很晚才为人所知，如明代以石存礼、冯裕为代表的海岱诗人；有的虽偏居一隅，而与文坛呼吸相通，如清代以李怀民（宪噩）为代表的高密诗派；也有不少隐居诗人，如新城徐

夜，虽其艺术成就很高，却因远离政治文化中心长期隐而不彰。至于下层文人的诗文、小说的创作活动，或因无力印行，或因成就不高，常常为文学研究者所忽略；清代以来各地诗文集，搜集了他们的作品，在文坛主流之外，也自成一一道风景。

同时，家族文学现象，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文化现象。由于长期形成的、以家族为本位的教育方式，以及重视家族传承的文化传统，在今山东境内，历代都有若干文化家族。除曲阜孔氏外，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如琅琊王氏和颜氏、泰山羊氏、东海徐氏和何氏；唐代如齐州（今济南）崔氏、武水（今聊城）孙氏、临淄（今邹平）段氏；宋代如巨野晁氏、三槐（本籍莘县）王氏等；明清时期，新城（今桓台）王氏、临朐冯氏、德州田氏、益都（今博山）赵氏等等，大都形成家族文学群体，有的如琅琊王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代有名家。

· 6 ·

总之，山东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山东诗人、文学家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曾经做出重大贡献。自清代康、乾之后，重视地方文学研究的山东学者卢见曾等，曾对明清以来的山东诗文进行整理、编选，如《山左明诗钞》、《国朝山左诗钞》、《国朝山左诗续钞》、《山左古文钞》、《山左人词》等。诗文作家较为集中的地区，如曲阜、济南等地，也有家族诗文集，或县内名家选集等，说明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，诗文创作活动也深入到社会基层。其中，如孔宪彝编纂的《阙里孔氏诗钞》和《曲阜诗钞》，前者收录孔氏诗人120人，后者收录曲阜诗人52人。其他，如《冯氏五先生集》（临朐）、《李氏三先生诗钞》（高密）、《济南朱氏诗文汇编》（济南）、《安丘曹氏家集》（安丘）、《绣水诗钞》（章丘）等。著名学者王绍曾先生主编的《山东文献书目》（齐鲁书社1993版），其中载录的山东

文学文献最为详备。每一个时代的诗文主流都反映着那个时代文学发展的方向，代表着那个时代诗文的主要艺术成就，而作为旁系支流的地方文学，也在自己的流域浮泛着特异的光彩。热爱祖国，关爱人民，关心现实、奋发向上的精神，构成这些作品的主旋律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而于诗文作家鲜明的个性之中，也分明有着地域文化精神的积淀与影响。因此，我们研究地方诗文状况及其发展，还是有意义的。

#### 四

早在八十年代，山东部分学者就曾酝酿山东文学的研究问题，并提出一些设想，但终因各自忙于教学与科研课题而没有着手。1995年，山东师范大学科研处把我提出的“山东文学研究丛书”列入学校“重大工程项目”，并给予经费资助，使我们这一愿望得以实现。《山东分体文学史》（四卷本），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
《山东分体文学史》，顾名思义，即写今之山东政区范围内的文学史，起自先秦，迄于近代。为便于梳理和研究，全书以文体分为四卷。全书在李伯齐、王琳主持下进行，分别由李伯齐、许金榜、王恒展、王琳主编。各卷参加编写的人员分工情况，由各卷自行说明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我作为项目的主持人，主要是主持这项工作的进行，后由教研室主任王琳教授予以协助。各卷具体编写工作，从纲目的制定到具体内容的取舍，以及通稿、定稿，则由各卷主编主持进行。

本书是对山东地区古代文学创作的第一次较为全面的整理和研究，草莱初辟，其难度之大，是可以想见的。由于缺乏直接的

参考资料，所有编写者不辞辛劳，披阅大量有关诗文集和乡土文献，搜求钩稽，不遗余力，力求对山东文学创作状况做出较为完备的整理，进而勾勒出山东分体文学发展的轮廓，历经数年，于今年八月最后完成。尽管如此，搜稽或有遗漏，评述或有不当，疏漏、错谬仍在所难免，敬祈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。

在编写过程中，编写者尽量吸取现有研究成果，曾经参考前辈和时贤的大量论著；凡所引述，一律注明出处。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，得到本校科研处以及齐鲁书社社长官晓卫先生的大力支持，刘海军、李军宏同志编辑书稿也付出辛勤的劳动，谨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忱！

李伯齐

2004年8月谨识

# 前 言

## —

今山东省辖区，大致为先秦齐鲁故地。齐鲁自古为文学之邦，是中国文化学术的重要发源地，也是中国诗歌理论的发源地。如被朱自清先生称为“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”的“诗言志”，最早见于《尚书·虞书》，是舜任命夔做乐官时说的话。孟子说：“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也。”<sup>①</sup>诸冯就是今山东诸城市<sup>②</sup>，东夷人是上古时期今山东地区的土著居民。舜号有虞氏，是传说中的古代圣王，实则为东夷族的领袖。东夷族既是生活在今山东境内的先民，舜也就是东夷文化的代表。

中国诗歌理论发轫于《尚书·虞书》，而奠基于孔子。孔子论诗，重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，强调诗歌为礼教政治服务。他精通音律，曾整理《诗经》，他把这部文学作品当作进行礼乐教育的教科书。因此，孔子指导弟子学《诗》，要求他们着眼

① 《孟子·离娄下》。

② 见徐北文《大舜传》附录《大舜行迹考》。济南出版社，1999年9月版。

于诗歌的政治效用。他认为学《诗》可以提高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，可以作为从事政事活动的依据。他说学《诗》“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”<sup>①</sup>，“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<sup>②</sup>在他看来，诗是礼乐的基础，彼此不可分割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<sup>③</sup>孔子十分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，提出“兴”、“观”、“群”、“怨”说<sup>④</sup>。所谓“兴”，是指诗歌的联想能力和感染力量，即朱熹所谓“感发志意”<sup>⑤</sup>；“观”，是观察社会，即“观风俗之盛衰”<sup>⑥</sup>、“考见得失”<sup>⑦</sup>，亦即认识社会的作用；“群”则是“群居切磋”<sup>⑧</sup>，互相切磋，互相砥砺，是互相感发、互相影响的作用。“怨”为“怨刺上政”<sup>⑨</sup>，即对现行政治得失进行有限度的批评。孔子上述有关诗歌本质特征及其社会功用的论述，奠定了我国古代传统诗学理论的基础。孔子论诗的精神，使后世文学理论家和诗文作家关注文学与现实的联系，反对形式主义文风，其影响基本上是积极的。在孔子以后的年代，经过儒家学派的发挥，在先秦两汉时期形成儒家“诗教”。“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。”<sup>⑩</sup>本谓《诗》教人“温柔敦厚”，是思想道德方面的要求，而后却成为创作诗歌的原则。因此，两汉经学家以政治眼光看待文

①④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小子何莫学夫诗？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草木虫鱼之名。”又，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子曰：‘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’”

②《论语·阳货》。

③《论语·泰伯》。

⑤⑦朱熹《诗集传序》。

⑥《论语集解》引郑玄注。

⑧⑨《论语集解》引孔安国注。

⑩《礼·经解》。

学作品，忽略了文艺自身特征和规律，也对文学发展造成消极影响。

魏晋以降，从曹丕到刘勰，反映了我国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之后文学批评的实绩，而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标志着中国早期文学理论的形成。其间籍出山东的刘桢、左思、颜延之、檀道鸾、王筠、任昉、徐陵、颜之推等，都有文学批评的言论。刘桢的有关论述已经散佚，就现存几条零碎材料来看，他重视作家独特的个性和文章的气势<sup>①</sup>。颜延之论诗主张以《诗经》为典范，有关诗歌的论述，见于其训诫子弟的《庭诰》，对后来的刘勰诗学有一定影响。与颜延之大约同时的檀道鸾著有《续晋阳秋》，对自汉及晋的文学发展过程进行了具体描述，其中关于后世文学“皆体则《诗》、《骚》”的提法，关于玄言诗兴衰过程和代表作家的论述<sup>②</sup>，都对研究这一段文学史和诗歌史具有重要意义。有意思的是，上述诸人，除徐陵外，其论诗宗旨大致与刘勰相一致，有的观点就为刘勰直接吸收。

唐宋时期，山东籍崔融、任华、王禹偁、穆修、石介、晁补之、李之仪、李清照、辛弃疾等诗文大家关于诗歌的言论，

① 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：“公幹亦云：孔氏卓卓，信含异气，笔墨之性，殆不可胜。”《文心雕龙·定势》：“刘桢云：文之体指（势），实有强弱，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，天下一人耳，不可得也。公幹所谈，颇亦兼气。”

② 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刘孝标注引《续晋阳秋》：“自司马相如、王褒、扬雄诸贤，世尚赋颂，皆体则《诗》、《骚》，傍综百家之言。及至建安，而诗章大盛，逮乎西朝（指西晋）之末，潘、陆之徒虽时有质文，而宗归不异也。正始中，王弼、何晏好《庄》、《老》玄胜之谈，而世遂贵焉。至过江，佛理尤盛。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。询及太原孙绰转向祖尚，又加以三世之辞，而《诗》、《骚》之体尽矣。询、绰并为一时文宗，自此作者悉体之。至义熙中，谢混始改。”



在当时及其后都有重要影响。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著录有《唐朝新定诗体》一卷，今人考证，认为是崔融所作<sup>①</sup>。此书涉及诗的风格、修辞与具体表现手法，当是近体诗作法指导一类的书，为近体诗形成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。宋代山东籍作家诗论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那就是反对浮艳文风，主张恢复重视诗文思想内容的传统，并形成宋代诗文特色的主流。王禹偁是宋初大家，他上承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白居易，下启欧阳修、苏轼，其有关诗文的论述对宋代诗文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。穆修继唐代韩愈、柳宗元和宋初柳开之后，提倡儒道与古文，为宋代欧阳修所领导的古文运动的前驱。石介及泰山学派主张继承和发扬儒家道统，开宋代理学的先河；文学则极力反对西昆体为代表的浮艳文风，主张文以载道，经世致用。晁补之强调重质轻文，辛弃疾主张重视诗文的内容和感情，都与王、石等一脉相承。

明清时期，李开先、李攀龙、谢榛、宋琬、王士禛、赵执信等有关诗文创作的论述，对当时及其后都有重要影响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都有崇高地位。李攀龙、谢榛为明“后七子”领袖，他们倡导诗文复古运动，主张继承汉唐诗文传统，试图激发起正宗诗文的创作活力。李攀龙没有专门的诗论，而其要求诗文“达于政”，强调“悯时政得失，主文而谏”<sup>②</sup>，强调诗歌“言情”的特点和“移情”的感化作用<sup>③</sup>，并重视文

① 王运熙、顾易生主编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(三)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三章《初唐文学批评》：“《文镜秘府论·地卷》有《十体》一节，有的抄本于题下有注语‘崔氏《新定诗体》开十种体’云云，当即崔融之《唐朝新定诗格》。”

② 李伯齐点校《李攀龙集》卷一六《送宗子相序》。齐鲁书社1993年12月版。

③ 李伯齐点校《李攀龙集》卷一六《送宗子相序》云：“诗可以怨，一有嗟叹，即有永歌。言危则性情峻洁，语深则辞气激烈，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摈弃而不容之感，遁世绝俗之悲，泥而不滓，蟬蜕滋垢之外者，诗也。”